

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周 怡 王建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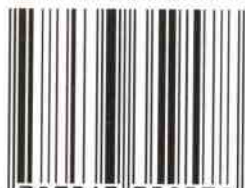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探讨了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文学创作的关系。鲁迅的文艺思想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同时鲁迅关注人性的社会学价值，所以，厨川白村的社会心理学对于鲁迅有着特别的启发。此外，该书通过鲁迅文学作品对艺术形象的选择、叙事结构、艺术场景、色彩意象以及死亡意识等诸多方面，探究了精神分析学说在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意义。

ISBN 7-5633-5957-5



9 787563 359578 >



上海贝贝特

ISBN 7-5633-5957-5/1·729

定价：18.80 元



精神分析理论 与鲁迅的 文学创作



周 怡 王建周◎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周 怡 王建周 著

责任编辑:魏 东 封面设计:张克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ltpress.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875 字数:150千字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3-5957-5/I·729

定价:18.80元

目录

绪 论 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1
一、20 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的初期阶段	2
二、30 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与影响的兴盛期	9
第一章 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20
一、鲁迅作品对艺术形象的选择	20
二、“游子归乡”式的叙事结构	22
三、艺术场景的心理意象	25
四、色彩的心理意象	28
五、死亡的探究	31
六、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33
七、中外的痴狂文化与鲁迅的狂人形象	35
第二章 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文艺思想	43
一、厨川白村与《苦闷的象征》	44
二、从弗洛伊德到厨川白村	51
第三章 鲁迅笔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	
及其与作者自我的关系	62
一、弟兄情义的背后	63

二、“差不多”与“说不清”	70
第四章 在怀乡和潦倒中饮酒:	
关于鲁迅小说中的一个特定情景	77
一、饮酒的审美条件:言谈的场地	77
二、潜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79
三、会心与移情	84
第五章 鲁迅小说里的死亡意识	88
一、面对死亡的道德意识	88
二、谁是谋杀者? 谁该负罪?	92
三、利器与杀心:革命时代的死亡	95
第六章 鲁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	100
一、单纯色的意象追寻	100
二、鲁迅的色彩模式与作品结构	106
第七章 鲁迅早期的新诗创作	111
一、梦中的求索和失落	111
二、桃花的自尊和百合的悲剧	115
三、爱之锁绊与爱之空虚	118
四、关于过去、将来、现在的思考	122
五、以文为诗,以思想批判为主调	124
第八章 战士的苦闷与叛逆者的忧郁:	
《野草》与《巴黎的忧郁》之比较	127
一、过客:人生悲剧性的追寻	128
二、幻想:人生悲剧的观照	131
三、社会批判:人道主义的破灭	136
四、思想者:心灵的自我解剖	139

第九章 家庭伦理的社会分析与精神分析:	
毛姆与鲁迅的问题作品《风筝》之比较	144
一、共同描述了一个人生失误的故事	144
二、失误的无可挽回	146
三、弗洛伊德的视角与民主启蒙的视角	147
四、冷嘲与反讽	149
附 录 精神分析小说的兴起及其范本:	
施蛰存的创作	153
一、早期创作的潜意识倾向	153
二、心理分析小说的尝试:《鸠摩罗什》	156
三、英雄·死亡·爱欲:《将军底头》	161
四、现代都市里的白日梦:《梅雨之夕》	168
五、施蛰存与鲁迅	174
后 记	180

绪 论

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精神分析理论与批评是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里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它的影响力涉及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仅从文艺上讲,它给这个领域所带来的变化,其广泛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现代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或思潮。艺术家拿它来指导创作,开掘人的心灵世界;理论家和批评家拿它来解释分析各种文学艺术文本,并由此及彼地考察艺术家主体意识,从而展示出那些连创作者自身也意识不到的东西。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此就成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据统计,他在文学艺术文论当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弗洛伊德一点儿也不会低估自己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这一变化,或者说是推动作用。他在《精神分析的困难之一》当中认为,近代以后发生过三次革命,给人类的自我中心观念以接二连三的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他推翻了地球中心论,将人类的生存世界抛到了无人可知晓的空间里,随之,人从无限大顿时化为无限小。第二次是达尔文及其生物进化论,如果说哥白尼的革命给人以环境地位上的打击,那么达尔文的结论则是涉及到本源与本质方面的问题。他论证出人类不是什么上帝或神的创造物,而是由非常低级的动物进化而来的。第三次则来自于弗洛伊德本人以及他的以“潜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分析理论。如果说达尔文的学说只是否定了人类祖先的神圣性,那么弗洛伊德的学说则是否定了现代人的神圣性。弗洛伊德以其大量的临床实验和推理,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由潜意识所驱使,而这个所谓的潜意识就是作

为本能的性欲。由此看来,“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这个定论千年的自我评价,就发生了本质性的怀疑。这三次革命从宇宙学、生物学到心理学,由远及近,最终是人自身,而且将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所自封的神性与理性等种种桂冠都剥落下来,显得是那么赤条条的。

精神分析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吉尔根认为,这种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社会:第一,提供了一种人的模式,此模式告诉人们,潜意识存在让你确信在没有快乐和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成功和健康。第二,为文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有趣的人性观,大大地开拓了他们的创作和研究领域。第三,为教育界提供了一种关于抚养儿童更深刻的观点。第四,创造了一种导致新的性开放的气氛。第五,提出了一种强调性驱力的人类动机观点,这一观点刺激了消费者研究,影响了广告业。第六,从理论上支持了对罪犯、少年犯、嗜酒者和吸毒者应进行治疗而不应惩罚的观点。当然,这个总结只不过是一家之言,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影响可能远不止这些。

一、20 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的初期阶段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最早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但与其接触可能更早一些。其传播的途径主要通过以英文为代表的欧洲语言作为直接传播渠道,以及以日本作为间接传播渠道。据陈厚诚和王宇先生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观点,在 20 年代初,译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学者主要有汪敬熙和罗迪先,此二人分别是这两条传播途径的代表。汪敬熙从西欧译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用意也十分单纯,就是将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科学介绍到中国,尚未能涉及到文学艺术领域。罗迪先就不同了,由于当时日本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强调科学艺术与社会改造的关

系,而这恰恰是中国急迫的需求。因此,所有到日本去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受到这种影响。罗迪先首先翻译的著作是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这部著作当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学说。厨川白村的另一部著作《苦闷的象征》在出版之前,就于1921年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首先登载其中的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据鲁迅先生所记:“《学灯》上明权先生的译文,当即从《改造》翻出。”三年之后,全书出版,鲁迅投入翻译,1924年9月22日开始动笔,只二十天,就译毕付梓,于当年底出版。这期间,鲁迅边译边印,将清样发给学生,作为他讲课的辅助教材。他之所以这么看重《苦闷的象征》,从情绪上来说,是由于自己当时的苦闷。他极需要一种新的、富有独创性的文艺理论来改变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那萎靡的精神,同时,他深感厨川白村的学说十分准确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心态。所以,在译完《苦闷的象征》三天之后,鲁迅又购得厨川白村的另外两部著作《出了象牙之塔》与《走向十字街头》,并投入翻译。厨川白村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改革精神的作家,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认同是有所选择和改造的。这就带来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它可以激发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对新理论产生极大兴趣,重视它的应用价值;一是由于这种改造,或多或少地削弱了该理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与此同时,对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并有所影响的学者是潘光旦先生。据他的回忆,在1920年,他正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就在图书馆发现英国精神分析学家霭里士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又过了一二年,潘光旦“又有机会初次和福洛依特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记得当时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不用说,也是在书库里自由搜索的一个收获。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福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译者出

国游学后,曾经把它移交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一度发表;后来归国,又把它扩充成一本小书,交新月书店出版,易名为《小青之分析》,再版时又改称《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现归商务印书馆。”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认为,一切本能皆以生存和生殖为本,马克思以生存为本,是为经济史观,弗洛伊德以生殖为本,亦颇能自圆其说。特别是精神分析面世之后,批评家得一新角度来关照文艺,使之意义益见醇厚。可见,潘光旦先生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不只是一般的介绍,而是投身于它的研究工作,这在当时是具有相当的胆识与开拓精神的。当然,潘光旦的兴趣和他的研究实绩,还得力于比他更早接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前辈。据潘光旦回忆,在他大概 12 岁的时候,就阅读了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父亲说:“这是青年人应当看而童年人不妨看的一本书。”另一位支持潘光旦的前辈就是他自己的老师——维新派人物梁启超。费孝通先生为此称赞说:“当时敢于在这个大师面前交上这样一篇在常人眼里很可能是‘离经叛道’或者至少是不太‘正经’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个大胆果断的行动。更不简单的是在民国早年那个时代这位大师竟用了奖励的口吻作出‘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的批语。”^①由此可见,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和研究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家庭与大学课堂,已经作为一种新方法、新学说而成立。

鲁迅与周作人也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人物,鲁迅的接受方式主要在于创作,周作人主要在于将这个理论与人性的解放结合在一起。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其创作历程竟以一个所谓“狂人”的形象作为发端,是颇值得深味的。人们从这个形象里看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也应该看到精神分析。“狂人”与世俗社会(包括历史)形成一种互为诊视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大哥为代表的世俗社会在诊视“狂人”,形成

^① 潘里士:《性心理学·译序》,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年,第1—7页。

一种对具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精神分析；另外的一种诊视是“狂人”对世俗社会与文明历史的诊视，形成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并总结出“吃人”的症结。周作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往往是与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他认为妇女的解放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解放，一是性爱的解放。他说，两性靠两种“牵引”，一是性的牵引，一是人格的牵引，他强调了本能的基础意义。周作人还区分了爱与欲的不同：欲是本能，爱是艺术，理想的爱是肉与灵的结合，但如果两者无法兼得，单凭纯粹的性行为，也是有价值的，就其人的本能来说，也是一种善和美。因此，周作人对女子性爱方面的所谓“放荡”，是持宽容态度的。鲁迅则认为，中国的妇女只有母性、女儿性，却没有妻性。要倡导妇女解放，就是要恢复她们的妻性，满足她们的性爱。

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在20年代中期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高觉敷先生。他首先翻译的是弗洛伊德1910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报告：《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此文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卷10号和11号。他还在《教育杂志》、《一般》、《学生杂志》、《中学生》等刊物上全面地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陈厚诚认为，高觉敷的长篇论文《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批判》代表了当时中国心理学界评介弗洛伊德学说的最高水平。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文明和进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弗洛伊德学说：第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传统的心理学（即理性心理学）划清了界限；第二，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中彻底地应用了因果原则；第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生的各个领域产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因此，弗洛伊德的功绩便大可纪念了。有了他的研究，然后梦和过失诙谐及神经病等非因果心理学所能解释的现象，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所以我们尽管骂精神分析为非科学，然而弗洛伊德对于决定论的坚持，实为科学心理学的一个有力的援助。”高觉敷十分注重将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他在3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

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除翻译和介绍弗洛伊德学说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他能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之上去认识和把握,将整个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做了全面的了解和研究。他对勒温、冯特、荣格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等传统的和现代的都有所涉猎,从而对弗洛伊德学说就有了一个客观的和辩证的理解。^①高觉敷也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翻译家,他在初版本的译序中就对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即对于5岁男童汉斯惊悸病的性的解释,由此而否认俄狄浦斯情结在该病例上的作用。

由于精神分析理论将性本能解释成人类意识以及所有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在那个冲破封建礼教的思想革命时期,性爱的表现就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再像过去旧的艳情小说那样隐晦地创作和阅读。以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为代表,他们极其擅长写变态的性爱,郁达夫在《沉沦》中写“他”的窥视癖;《茫茫夜》的于质夫与吴迟生搞同性恋。郭沫若在《叶罗提之墓》里写叶罗提7岁时在后花园见到新婚的堂嫂,就产生了恋情。陶晶孙的《木犀》写中学生素威爱上比他大10岁的小学时代的老师。这两部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这些著名的文学家兼学者在创作实践的同时,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以表现性爱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阅读的引导。郭沫若在1922年的《晨报副刊》发表评论郁达夫《沉沦》的文章,针对社会舆论的非议,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依据予以批驳和矫正。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而体现在郁达夫作品里的主题正是一种性欲的升华。当然,郭沫若更多的是借此向旧道德开火:“他那大胆的自我表现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大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

^①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闻一多对 20 年代的浪漫抒情小说家们这样评价说：“他们的烦恼和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擻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们的甜处，也爱他们的辣处。他们决不肯逃脱，也不肯降服，他们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怨。”闻一多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类作家在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候的心理状态。

还有 20 年代中后期的戏剧，一方面新文学运动的落潮让文学家们格外苦闷，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放弃新文学之初易卜生式的写实主义，开始注重发掘人的意识，分析人的心理，表现精神变态、恐惧、绝望、死亡。在这些剧作家看来，世界是空虚的，只有内心世界才是真实。田汉《古潭的声音》描写一位善良的诗人从堕落中救出一位舞女，欲给予她精神上的升华，让她懂得“生命是短暂的，艺术是永久的”。而那位舞女在心里始终有一种抹不掉的愿望，将一汪深不可测的古潭视为“漂泊者的母胎”，而且执意要投身其中，去倾听里面发出一种什么声音。她自白道：“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女孩子，哪里也不曾留过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好像随时随刻望着那山外的山，水外的水，世界外的世界，心里早就做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准备。我本想信先生的话，把艺术做寄托灵魂的地方，可是我的灵魂告诉我，连艺术的宫殿她也是住不惯的，她没有一刻子能安，她又要飞了。”最终，这个不可言状的诱惑让诗人也跃身古潭。诗人对着古潭喊：“古潭啊，你藏着我恐惧的一切，我想慕的一切，你是漂泊者的母胎，你是漂泊者的坟墓。”这个以展现人物潜意识为特征的戏剧，还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死亡本能”之说，即激发一个人回复到有生命之前的冲动，在该剧则表现为回归母胎的潜意识本愿。那个神秘莫测的古潭，正是母胎的象征，包含着诞生与死亡的双重意义。在二三十年代之

交,诞生了一批女性题材的历史剧,其中有好几部以女性的性爱意识作为表现主题,如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熊佛西的《兰芝与仲卿》、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王独清《杨贵妃之死》。女剧作家袁昌英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用弗洛伊德理论独创性地创造了焦母这个形象,对其进行深层心理剖析,将其性压抑的潜意识开发出来,使这个形象也蒙上一层悲剧色彩和叛逆色彩。剧中的这个人物说:“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成我们精神上的情人。”她还质问:“从我们的怀内把我们的儿子一把夺去,一骨碌送到别人的怀里,这是公道吗?”剧作家将弗洛伊德学说与当时的妇女解放思想紧密结合,呼喊出时代的声音,也是女性的声音:“天下的母亲难道不知道反吗?我……我就胆敢做一个叛天之徒!”袁昌英当时作为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者的态度来重新解读那首汉乐府诗《焦仲卿妻》。她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运用于焦母与儿媳的矛盾冲突中去,指明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仇视,有她们作为女性的心理必然性。儿子处于母爱与妻爱的情感之间也必然面临尴尬和苦恼,甚至成为牺牲品。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分析,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更会造成这种情感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封建礼教在家庭伦理道德上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人际关系准则,其中对女子的规定是更加苛刻的,所谓“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夫的焦妻与从子的焦母,所产生的冲突显然要在心理因素的基础上再次升级。两个女人是在争夺依从权,由此而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控制地位,而这一切都是要通过家庭中的男人来实现的。当然,就《焦仲卿妻》之原作来说,“三从四德”在其后,但作为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袁昌英将精神分析学说与妇女解放学说做了很成功的结合。值得一提的还有曹禺的《原野》,其中的情节和人际关系与《孔雀东南飞》有相似的地方,这出戏里也有一个焦母,与其儿媳金子处于那种难以调解的矛盾之中。这里面除去人物阶级出身的矛盾之外,作者思考更多的是心理分析的因素。

在20年代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的早期,这种思潮对封建礼教的

冲击是相当强烈的。它直接影响的领域就是文学艺术。然而,真正从文学批评和美学的角度从事精神分析研究的学者还没有出现,真正迷恋于这种思想而投入创作并形成风格的作家也没有出现。直到30年代,在上海文坛上,专事精神分析小说的作家群出现了,施蛰存是其代表。此外,还有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写性爱,写变态,写梦幻,写潜意识,表现超乎寻常伦理的性爱关系。杨义先生将刘呐鸥与施蛰存的文学师承关系概括为弗洛伊德学说——显尼志勒——爱尔兰乔伊斯——横光利一。张爱玲对中国古代的艳情小说情有独钟,因此其作品里的心理分析因素都是本土化的,也就更容易打动读者。此流派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热衷于精神分析这个理论学说,而后将它融入艺术形象的创作中,即一个人物和故事的精神分析学创造。

二、3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与影响的兴盛期

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呈现出多元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自由派文学,先锋文学与商业文学同时并行发展、繁荣。在这个时期,专门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出现了,如朱光潜;专门从事心理小说创作的作家出现了,如施蛰存;专门以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重新解读的研究家也出现了,如闻一多。

朱光潜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了解和运用,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他对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都有较为精深的研究,所以,他对精神分析的把握是从美学的视角切入的,在当时的中国成就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文艺心理学。朱光潜于1930年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出版《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悲剧心理学》(英文版,1983年由张隆溪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36年出版《文艺心理学》(上海开明书店)。如果说20年代潘光旦

与高觉敷的翻译介绍侧重于人类普遍的性心理,那么 30 年代的朱光潜更侧重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上的精神分析。对于精神分析小说来说,这种理论准备是决不可以忽略的。朱光潜特别看重精神分析中“压抑”和“移置”两个范畴。他在《变态心理学》中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而且将此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试图解释其中的心理逻辑。例如他以潜意识理论解释了唐代沈既济所撰小说《枕中记》,他还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中总结出一种梦的模式:大概是某书生于某个薄暮黄昏时分行至某地,巧遇某一佳人,一见钟情,以盛宴美酒相邀,私订终身,结成秦晋之好。然而,此等大好光景却是一场梦境而已,主人公只不过在伴着占幕而眠。朱光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千篇一律的故事还颇受读者的欢迎,其中含有性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朱光潜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偏激成分表示不以为然。他赞同弗洛伊德学说直面人性邪恶的科学精神,但他决不将这种所谓的“邪恶”看作是人类的自然天性,而是把它视为理性的大敌,人们掌握精神分析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和疗治那些非理性的“邪恶”,这似乎是他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前提。朱光潜在这部著作中说:“不但是学术专家,就是一般做父母的人也必须明白儿童性欲发展的过程,才好设法避免‘情意综’(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与精神失常的种因。总而言之,凡是做人的人都要明白心理的危险,都要明白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康,才可以替自己、替社会造幸福。”显然,朱光潜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社会功利意义还是十分看重的。他承认本能欲望的原动力意义,但否认它与审美的必然联系。他说:

我们并不否认原始的欲望是文艺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但是我们否认原始欲望的满足就是艺术所给我们的特殊感觉。弗洛伊德的文艺观还是要纳入“享乐派美学”里去,它的错误在把欲望满足的快感看成美感,或是于这种快感以外,在